



读懂中国梦丛书

DUODONG ZHONGGUOMENG CONGSHU

方向 梦想的

谢春涛 主 编

卢 毅 编 著

学习出版社



读懂中国梦丛书

DUODONG ZHONGGUOMENG CONGSHU

方向的 梦想的

谢春涛 主 编

卢 毅 编 著

学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想的方向 / 卢毅编著. -- 北京 : 学习出版社,
2015. 5

(读懂中国梦丛书 / 谢春涛主编)

ISBN 978-7-5147-0539-3

I. ①梦… II. ①卢…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学习参考资料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9428号

梦想的方向

MENGXIANG DE FANGXIANG

谢春涛 主编 卢毅 编著

责任编辑: 吴保平

技术编辑: 周媛卿

出版发行: 学习出版社

北京市崇外大街11号新成文化大厦B座11层 (100062)

010-66063020 010-66061634 010-66061646

网 址: <http://www.xuexip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9

字 数: 116千字

版次印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7-05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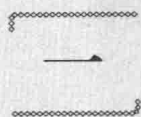
定 价: 31.00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contents / 目 录

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
(一) 兴盛与危机	2
(二) 一部苦难和屈辱史	14
二、不断破灭的强国梦	25
(一) 统治集团的自我调整	26
(二) 农民的梦想	36
(三) 改良与革命	42
三、民族独立梦的实现	51
(一) 形形色色的“中国梦”	53
(二) 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72

四、国家富强梦的探索.....	91
(一) 旧貌换新颜	92
(二) 追梦中的曲折	103
五、越来越清晰的复兴梦.....	115
(一) 开启改革开放的航船	116
(二) 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23
(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129
后记.....	134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有所思即有所梦，梦的内容反映的是追求、体现的是抱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背后，是千年的回响、百年的渴望。然而，这个梦想却是随着另一场梦的破碎产生的。

晚清的中国，已呈现出一种垂垂老矣的姿态：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备废弛，而同时代的欧洲，却因工业革命的巨大革新力量，整个社会显现出勃勃生机。这样两种文明相遇，注定了两者间将充满冲突和碰撞，也决定了中国将迎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 兴盛与危机

4000 多年前，在黄河流域，一个叫“夏”的国家诞生了。此后，无论王朝如何兴替，外敌如何强大，内乱如何严重，中华文明都以其博大和坚韧薪火相传，从未间断。尽管历尽沧桑，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始终是历史长河的主流。历史似乎可以永远按照“周期律”演进下去，而无须考虑其他因素。但近 500 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危机开始了。

1. 中华文明的辉煌

人类文明的星空，群星闪烁，许多文明似流星一样一闪即逝，但有一颗闪亮的恒星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就是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国有着 5000 多年连绵不断的悠久历史，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的大国，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并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根基。此后的历朝历代由于人口压力，均全力发展农耕技术，长期领先于欧洲，这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育种混合选择法，比德国选种家仁博 1867 年改良黑麦和小麦使用的混合选择法早 1300 年。《齐民要术》中以豆保谷养地的豆类谷类作物轮作制，比英国早

了 1200 年。1406 年中国的《救荒本草》是食用植物学杰作，西方从 18 世纪起才有类似作品。耧是公元前 2 世纪西汉时中国人发明的多管种子条播机。一人扶柄，一头牛或一匹马作动力拉动耧前进，种子就均匀地陆续成直行播下，很有点像现代的机械播种机。而那时的西方还在用手撒播种子，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还严重影响农作物产量。据西方专家估算，在西方人使用种子条播机前，中国耧的效率至少是西方人手工播种的 10 倍，而用耧播种的农作物产量至少是用手播种的产量的 30 倍。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也是举世闻名的。中国素有“瓷国”之称，古代瓷器的制造在全世界享有盛誉。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 3000 多年前的商朝，到唐朝时已经高度发展，宋朝时登峰造极。日本的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在福建学到了一些宋代的制瓷技术，回到日本后被称为“陶祖”。而欧洲直到 18 世纪才造出真正的瓷器。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生产丝绸的国家，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在河北、河南一带从事养蚕和生产丝绸。著名的“丝绸之路”，它的起点就是号称“丝国”的中国。

在冶炼技术方面，中国在公元前 6 世纪便掌握了冶炼生铁的技术，而欧洲到 14 世纪才炼出生铁，比中国晚了约 2000 年。中国在战国早期就能生产可锻铸铁，而 18 世纪初法国才炼出白心可锻铸铁，19 世纪初美国才炼出黑心可锻铸铁，都比中国晚 2000 多年。中国在西汉末年发明了炒钢法，而欧洲人到 18 世纪才知道这种方法，比中国晚了 1700 多年。中国在战国时期已提出青铜配方的“六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对合金规律的发现。中国从西汉起就能大量生产铜锌合金（黄铜）；而欧洲人直到 16 世纪才知道锌是一种金属，到 17 世纪才学会从方铅矿中炼出锌来，比中国晚了 1600 多年。中国在西汉时就发明了胆水炼铜法，而

欧洲人到 15 世纪才发现这种现象，比中国晚了 1500 年以上。

在天文学方面，中国是文艺复兴前对天象观测得最系统、最精密的国家。早在夏代，中国就已开始了恒星观测。唐朝时已经观测到 1464 颗恒星，标在星图上的也有 1350 多颗。北宋时又进行了 5 次大规模的恒星观测，终于将已观测到的 1464 颗恒星全部绘于星图之上。到了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于 1276 年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精确度更高的恒星观测。除了测正传统的恒星位置外，郭守敬还观测了前人未命名的恒星 1000 多颗，从而使记录的星数从 1464 颗增加到 2500 多颗。现在根据科学测定，人类用肉眼观察到的恒星只有 2500—3000 颗，可见郭守敬主持观测恒星的精确度之高。另外，郭守敬还创造了授时历，确定一年为 365.2425 天，和欧洲 1582 年才应用的“格里历”相同，但早了 300 年。中国早在公元前 1361 年就有了日食记载，对太阳黑子及其周期和超新星有最早的系统记载，而欧洲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是公元 807 年，比中国迟了 850 年，而且还一度误认为这一现象是水星凌日。哈雷彗星也是中国记录得最早、最系统、最完备；从公元前 613 年至 1910 年，它共出现 31 次。在 2500 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经历了无数次改朝换代，竟一次也没有错漏，这不得不使中外天文学家为之惊叹。

在数学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十进位制的国家，比国外最先采用十进位制的印度大约早 1000 年。公元前 200 年《九章算术》出现后，中国数学便与希腊数学各霸一方。1500 年前，中国古代著名数学家祖冲之就应用割圆术，精确计算出圆周率的数值在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间，比阿拉伯人约早 900 年，比欧洲人早 1100 多年。北宋贾宪创立的增乘开平方法，比西方早 770 年，他作的开方作法本原图，比法国人早 400 多年。西方解高次方程的霍纳法出现于 1819 年，而南宋数学家

秦九韶 1247 年便已提出同样方法，早于西方 572 年。元朝朱世杰又提出四元高次联立方程解法，比欧洲早 400 多年。负数概念及正负数的运算也起源于中国。中国人认识负数及其运算规律要比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早几百年，比欧洲人早 1000 多年。此外，中国发现勾股定理也比西方毕达哥拉斯定理要早 100 多年。

在物理学方面，11 世纪沈括用纸人测定共振的实验是世界首创，15 世纪意大利的达·芬奇、17 世纪英国牛津的诺布尔和皮戈特才开始做了同类的实验。沈括还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地磁偏角的人，欧洲直到 1492 年才由哥伦布发现地磁偏角。16 世纪朱载堉发明的十二平均律，则为今天键盘乐器的创造打下了理论基础。他的十二平均律传到欧洲，受到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的高度赞扬。

在化学方面，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出的沉积地形形成原理和雁荡山流水侵蚀地形形成原理，欧洲直到 18 世纪才由英国科学家郝登提出来。13 世纪以前，西方尚不知硝石为何物，而中国早在公元 9 世纪就已用它制成火药，10 世纪时火器的硝烟已经弥漫于战场。

在医学方面，中国是唯一拥有连续性著述传统的国家，从商代开始记载疾病直到近代从不间断。欧洲人 19 世纪才发现维生素 B 与脚气病的关系，而元代人忽思慧早在 1330 年就达到这种认识。宋人从人尿中提取性激素更是惊人之举，而西方到 1927 年才做到这一点。中国 1000 年发明的天花预防接种法是免疫学的先驱，对人类保健事业有卓越贡献。此外，独特的针灸，巧妙的脉学，奇异的中药，至今仍在国际享有盛名。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经过 20 多年的考察、试验、整理、研究，编撰出对世界药物学有巨大贡献的《本草纲目》一书。该书 1590 年正式出版后，首先传到日本并很快被翻刻 9 次，随后又传到朝鲜和越南，

到十七八世纪时传到欧洲，先后出现德文、法文、英文、拉丁文、俄文的译本或节译本。值得注意的是，《本草纲目》一书还是一部最早采用植物分类法阐述植物医药原理的著作，它比西方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提出的植物分类法早 150 多年。

在中华文明史上，我们还可以随口举出无数个世界之最：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是春秋末期孙武所作的《孙子兵法》、世界上最早的教育论著是战国末期孟子的学生乐正克所著的《学记》、世界上最早的数学文献是战国时尸佼所作的《尸子》、世界上最早记述勾股定理和提出负数概念的数学著作是汉代的《九章算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世界上最早的农书是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此外，中国还最早发现氧气，最早给风定级，最早驯养猪、鸡、鱼，最早酿酒和醋、提炼盐、制蔗糖，最早发明伞、独轮车、钓鱼器、马镫、风筝和机械钟，等等。

其中，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领先地位尤为突出，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而西班牙、德国、意大利、英国等西方国家，则分别在 12 世纪、12 世纪末、13 世纪末、15 世纪末才先后学会造纸，美国直到 17 世纪末才出现真正的造纸工场。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用来大量翻印书籍，而欧洲直到 15 世纪才有活字印刷，比中国晚 400 年。此外，中国还最早发明了火药和指南针，为欧洲走向近代化作了重要的技术准备。马克思就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不仅表现在科学技术方面，而且还拥有许许多多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思想家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王充、朱熹、王阳明、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文学家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关汉卿、吴承恩、蒲松龄、曹雪芹，政治家管仲、商鞅、贾谊、董仲舒、魏征、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艺术家王羲之、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颜真卿、柳公权、郑板桥，史学家司马迁、班固、陈寿、刘知几、杜佑、司马光、马端临、章学诚……这些名字如群星璀璨，辉映着中国古代丰富的文明，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赞美中华文明的并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全世界都公认中华民族创造了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确实，在 19 世纪以前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古代文明一直居于世界前列，相比于当时的其他地区和国家，中国富饶、强盛，文明、进步，经济总量长期居世界第一。用西方某些汉学家的话来说，那时的中国是“发达国家”，而西方则是“发展中国家”。

早在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并向欧洲社会呼吁，“我们绝不应该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上，来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加以评头论足，因为我们还处于野蛮时代时，这个民族就已经具有高度的文明了”。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亦在该书“中国”条目中，盛赞“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19 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也说：“300 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时，他们看到中国的几乎一切工艺均已达到一定的完善阶段，并为此感到惊异，认为再没有别的国家比它先进。”

到了 20 世纪初，享誉全球的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则说：“从若干方

面观察，中国是我所见的最伟大的国家，这不仅是数目上的最伟大与文化的最伟大，而且是智慧上的最伟大。”而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更是说：“谁要是不嫌麻烦，从头至尾读完这本书，我相信他会惊奇地看到，欧洲从中国汲取去的技术是何等的丰富多彩！”他还说，中国的科技“一直在稳缓地前进”，“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世界受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顽强的手工业者之赐，远远大于受亚历山大时代的技工、能言善辩的神学家之赐”。李约瑟还曾以《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为书名，用简明通俗的文字介绍了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

1990年，美国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在《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一书中写道：“在1400年以前的数百年里，中国人在技术上的发展势头令人惊叹，而且在这些事件可以衡量的范围内，其发展速度堪比甚至高于欧洲。”他还总结了我国取得的10项技术成就：水稻种植上的重大改进彻底改革了中国农业；在公元前10世纪，铁犁取代了中国古老的青铜犁；宋朝和元朝时期引进了条播机、除草耙和长齿耙；在鼓风炉的使用方面，中国人领先欧洲人1500多年；在纺织业，中国和欧洲的手纺车大致出现于同时期（13世纪）；在水力的采用上，中国与欧洲大致并驾齐驱；在10世纪和11世纪，中国就制造了精巧的水钟；在船只设计和建造上，中国人领先欧洲人好几百年；中国人发明了纸，这比欧洲人早了1000年；在公元700—1400年间，中国出现了瓷器、油漆、医学（针灸）等能展示技术成就的例子。因此，莫基尔不无感慨地指出：“可以说，中国人离统治世界只有咫尺之遥，接下来却渐行渐远。”

2. 西方的崛起

清朝的康乾盛世，国力和声威都达到了鼎盛。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曾统计，1820年中国的GDP占到世界的33%，经济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与20世纪末美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大致相当。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的《亚洲史》一书也指出：“总的说来，大概到19世纪中叶前，大多数中国人在食衣住行方面的物质生活看来一直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但令人遗憾的是，清朝的统治者在盛世辉煌中变得骄傲自大，逐渐沉醉、昏睡了，变成了一个故步自封、步履蹒跚的迟暮老人。

而此时欧洲却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走出了长达800年中世纪的黑暗，掀起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政治革命。1640年前后，中国正经历明清交替之际的社会震荡，而英国则揭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这是两个性质大相径庭的事件，中国是传统的改朝换代，并未改变君主专制制度，所谓“百代犹行秦法政”，而英国则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宣告着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变革——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此后，美国也于1775年吹响了独立战争的号角，法国民众则于1789年涌上街头，攻占了巴士底狱。这一系列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与此同时，一场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一系列新知识、新技术被西方各国广为接受。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说。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钟摆运动，发明了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手段。特别是在17、18世纪之交，

牛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足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率先开始工业革命。蒸汽机广泛应用于生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社会生产力成千上万倍地增长。“到1830年，300名女工用手工纺出的棉纱量，如果用机器，只需要1名女工就可以完成；18世纪初，在英国炼1炉铁约需3周，到19世纪中叶仅需20分钟。”在工业革命中，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到处工厂林立，高耸入云的烟囱喷出缕缕烟雾，成片的厂房发出巨大的机器轰鸣，宣告田园时代的宁静逐渐远去，一个全新的现代工业社会已经到来。资本主义把人类从来没有见过的巨大生产力像魔术般呼唤出来，喷发涌流，社会生产和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制度障碍的最终扫除、技术的日益进步、市场的持续兴旺和殖民地的不断拓展，使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的50%，一度号称“日不落”帝国。随后，法国、美国等国家也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道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物不断涌现，它们发明了火车、电灯、电话、电报，发现了石油，不断发明和更新战争武器，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大炮和巨舰。这就导致世界格局发生了“乾坤大挪移”，正如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

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国际力量的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古老的中华文明却逐步走向了衰落。当欧美国家纷纷实行民主政体时，清朝统治者则把皇权制度推上了顶峰。在专制主义的束缚下，中国的思想界如一潭死水般沉寂。1748年，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写下《论法的精神》，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范围内的一切事情的权利。而3年后，中国的山东潍县县令郑板桥却写下“难得糊涂”条幅，不久辞官归隐。1789年，法国发表《人权与公民权公约》，高呼自由、平等、博爱，以人权和法制作为新秩序的奠基石。而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小心翼翼地审视自己的文字，生怕掉进“文字狱”的罗网中，噤若寒蝉的人们“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

在清朝的知识界，还弥漫着浓厚的轻视科技风气，甚至将之蔑称为“奇技淫巧”。清初的戴梓曾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洲根本”，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谗言，将戴梓充军关外。1792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收藏，根本未曾想到其中的科技含义和军事价值。于是经过200多年的禁锢，清朝的科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到1840年，中国传统农耕方式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而英国农场已有了蒸汽机；全世界铁路总里程已达9000公里，而中国人还不知铁路为何物。西方近代科技的蓬勃朝气与中国传统科技的日薄西山，西方市场经济的确立与中国自然经济的延续，西方产业革命的高歌猛进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种种差距使中国落伍了。

而在这个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眼看世界的时候，清朝统治者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故步自封，依然生活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对西方发生的巨大变化全然不知。他们不知道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在西方世界大工业热火朝天的生产中，早已相形见绌、落后不堪；他们也想不到当中国仍在制作和使用落后的武器——弓箭来保卫自己时，西方已经利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制造出了威力无比的枪炮。在他们的想象中，欧洲人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民族。英国王位竟可以由女儿继承，女王逝世后再由其子女继承，这种改姓乱统的现象，无疑说明它是一个无父无君的蛮夷之邦。而法国国王披长发，常常烹食儿童，显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活妖精。俄国女王更糟，经常更换情夫，几个月或一年就把情夫砍头，再换一个接替。根据这些认定，中国悲哀地发现，欧洲人无异于犬羊，是不知礼义廉耻的怪物。

更为致命的是，在清朝统治者的印象中，中国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她根本就是整个世界，天下就是中国，世界就是华夏，像英国那样的国家不过是来朝贡的蛮夷小国。他们死守这种“华夷之辨”的思想，自恃“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拒绝与外部世界平等交流。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于天朝有益”时，乾隆皇帝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飭，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藉此些微远物也。”他们甚至认为，欧洲人喝牛奶、酪浆不易消化，必须饮茶才能化解，假如几个月不饮茶，